

● 李永顺文集

秋 获 集

李永顺 著

秋 获 集

李永顺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获集/李永顺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李永顺文集)

ISBN 978 - 7 - 81112 - 414 - 9

I. 秋… II. 李… III. 教学研究—中学—文集
IV. G63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3067 号

李永顺文集

秋获集

李永顺 著

策划编辑: 伍 奇

责任编辑: 李兴和 刘 焰

封面设计: 薛 峥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30.375

总 字 数: 76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414 - 9

总 定 价: 65.00 元 (共两册)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自序

有人说，中学教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匠”型（即教书匠），一类是“学者”型。

就这一问题，我请教过长辈、同辈乃至小辈，其含义是什么？聆听诸家之言后，我领悟出其内涵大致是：这两类中学教师，在教学上都上得去、下得来，有的还可以把书教得很好，深受学生、家长和社会欢迎。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二者又存在着一些差异。前者，靠老祖宗的法宝“时间加汗水”（即古代的“头悬梁，锥刺股”）来取胜；后者，则是靠教研科研来提高教学质量。前者，学生苦，教师更苦，师生苦成一团，苦不堪言；后者，则是以教师的苦来换取学生的乐，使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师生都有苦有乐，在苦中乐着，或在乐中苦着。前者，授人以“鱼”；后者，则授人以“渔”。前者，重在知识的再认再现；后者，重在能力的培养与智力的开发。前者，重在口授，忽略笔耕；后者，二者并重。这种归纳，不一定准确、全面，但亦可作些参考。

自1960年从教以来，对上述界定，我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决心努力争取做后者。大概就是这一动力驱使，才会有这本拙作的产生。到1996年退休，我的教书生涯基本结束

了。说“基本结束”，是指离开了我所任教的云南师大附中的讲台，但仍还在自己创办的云南西点文化学校中打拼着，也还在昆明市历史教学教研的舞台上时不时地“闪现”。但总的说来，是退下来了。回首往事，学者型的中学教师，我还不够格。但总算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为达此目的，我在主教中学历史之余，还不自量力地应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云南民族大学夜大、电大、云南教育学院、北京自修大学云南分校等高校之邀，讲授过大学本科，夜大、函大专科的中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时，还帮助云南省教育厅教研室、昆明市教委教研室（现均改为“教科院”）、玉溪市教科所、红河州教研室、楚雄州教研室、德宏州教研室、西双版纳州教研室，以及文山州、丽江市、迪庆州的一些县、保山市等做了一些培训教师或高考复习指导的工作。这些教学、教研活动，又大大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和能力。我非常感谢这些单位的领导，是他们给予了我机会，提供了舞台，去实践自己的目标。

在教学中开展教研科研，以教研科研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还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活、新、深、松。活，即讲课生动活泼，教法灵活多样。新，即在保持传统教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观点新颖，争取每节课都要讲得有新意。深，发掘教材内涵有深度，对重点、难点能深入浅出，讲深讲透。松，课堂气氛活跃，在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中授业传道。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整个教学生涯中，形成了一个怪现象：平常不做作业，除了学校规定的期中考、期末考外，也不考试，但教学效果仍可以。即使在高考中，成绩也还不错。学生负担不重，未淹没在题海中；我也比较“解放”，不为每天批改作业所困，能有时间“充电”，写东西，也才有《秋获集》问世。这得感谢20世纪60年代初的“九年一贯制”教育改革。它规

定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不准布置课外作业，只教不考。从此，迫使我不断研究如何改进教学，走教研科研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道路。最终形成了教学要45分钟解决问题，向45分钟要质量，以及“中听中考”是好教师标准等理念。正是这些理念，形成了我的教学“怪”模式。

出版《秋获集》，算是将我教学生涯中的教研、科研活动做个总结。只是此事距我退休后，又是十年了！

专家预测：21世纪的中学教师，将转型为学者型的教师。可惜我已经被时光踢出局了，无力再拼搏，只能袖手旁观，看年轻人的了。

李永顺

2007年4月于昆明

目 录

自 序	(1)
-----------	-----

论文选辑

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应该再议	(3)
辛亥革命前夕云南革命党人的斗争	(12)
“重九”起义与云南军都督府的建立	(22)
滇军的援川援黔援藏	(34)
云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42)
孙中山与云南辛亥革命	(61)
孙中山与刀安仁	(77)
护国功勋永驻	(80)
谁是护国运动的领导者	(97)
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07)
西南联大与云南	(115)
从民盟的初期活动看多党合作制的历史渊源	(131)
《云南抗日战争史》述评	(142)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	(146)
试论“一二·一”运动的深度、广度及主力	(165)
“一二·一”运动在海外的反响	(178)
黎明前的抗争	(180)

解放战争时期昆明师院附中的革命斗争	(200)
云南和平解放的历史启示	(2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的心理承受力 初探	(232)
中国领土丧失知多少	(248)
枕木根根皆血泪	(251)
香港割让的教训和回归的启示	(254)
爱国主义是历史教学永恒的主题	(261)
云南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应上新台阶	(270)
滇人铜鼓甲天下	(279)
多姿多彩的云南少数民族住房	(281)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麦哲伦之死	(283)

昆明史话

远古的“昆明人”	(297)
庄蹻入滇	(300)
秦开“五尺道”	(302)
西南丝绸之路	(305)
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	(308)
诸葛亮“南抚夷越”	(314)
纷扰动乱三百年	(318)
南诏国建拓东城	(323)
鄯阐城的崛起	(327)
赛典赤·赡思丁的贡献	(331)
壮丽的大城	(335)
“金碧交辉”显异彩	(339)
滇池之滨的伟大航海家	(342)

吴三桂权倾云南	(345)
昆明的三坊十八铺	(349)
资本与鸦片在昆明	(352)
海内第一长联	(355)
风雨凄凄入近代	(357)
杜文秀大军攻昆明	(361)
如狼似虎两强盗	(365)
洋务、维新在昆明	(369)
“重九”起义放光彩	(373)
护国运动建奇勋	(377)
“五四”运动在昆明	(381)
党组织在云南的创建	(385)
红军长征过昆明	(389)
聂耳和《义勇军进行曲》	(393)
西南联合大学	(397)
大后方在抗战中的奉献	(401)
“一二·一”运动在昆明	(405)
李闻惨案	(410)
五华山升起五星红旗	(413)

历史人物

勾股先师——商高	(419)
让贤政治家——鲍叔牙	(421)
大教育家——孔子	(423)
春秋时期的经济改革家——管仲	(425)
能工巧匠——鲁班	(427)
爱国商人——弦高	(429)

战国时期最早的改革家——李悝	(431)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433)
著名的水利家——李冰	(435)
杰出的军事家——孙武	(437)
顽强的改革家——商鞅	(439)
西汉礼仪改革家——叔孙通	(441)
西汉商业改革家——晁错	(443)
西汉农业改革家——赵过	(445)
西汉法制改革家——刘恒	(447)
西汉财政改革家——桑弘羊	(449)
有胆有识的改革丞相——曹操	(451)
北魏女改革家——冯太后	(453)
拓跋宏巧治顽固派	(455)
少数民族改革家——宇文泰	(457)
难得的贤内助——长孙皇后	(459)
唐代理财家——刘晏	(461)
杨炎与“两税法”	(463)
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历史教训	(465)
卓越的蒙古族改革家——忽必烈	(468)
耶律楚材不怕冒犯权贵勇于改革	(471)
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473)

教 学 研 究

改进历史教学的体会	(477)
浅谈中学历史教师的知识更新	(480)
略谈历史学科的复习与答题	(486)
简论中学历史教学基本功	(489)

关于历史课的备课	(498)
怎样处理历史教材	(521)
论历史课的课堂教学艺术	(536)
“中听中考”，好老师首选	(562)

论文选辑

作为中学教师，教育教学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要进行学术研究，相当困难。但从1960年大学毕业从教时起，我就决心给自己“加码”：再忙，也要写点东西。目的在于不断提高自己，要给学生一碗甘甜的水，老师必须要有一桶新鲜的水。

可是，我的这一愿望，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无法实现的。每当我才动笔，就有好心人发出警告：“小李，不要走白专道路！”我只好迅速刹车。尽管心中不快，也不能不作罢。“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倡思想解放，肃清极左思潮，给学术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我也敢写文章了！从这组文章发表的时间来看，一眼就可看出，几乎全是1979年以后的事。这大概也反映了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是多么息息相关。

这组文章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应该再议》一文。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特别是近代史下限问题，我早有看法，但一直不敢吭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解放，首先就想写写这个问题。写好后，一直压住，没有勇气拿出来发表。当时在《昆明师院学报》当编辑的好友余嘉华得知我这篇文章的处境后，便来动员我交给他发表。我怀着准备挨批的不安心情，把文章给了余先生。文章发表后，常去打听是否有批判文章和信函。余嘉华先生说：大概《四川大学学报》有篇不同意见的文章，其他高校学报倒是发表了不少相同观点的文章。后来，我又收到一位在广西当兵，名叫杜英鹤的学生来信说：他在《新华月报》文摘上看见了 my 文章的摘要。不久，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学生崔汝林也来信说：他在学校图书馆见到了山东曲阜师院编的《史学争鸣录》上，摘登了我的这篇文章的提要，还寄来了复印件。总之，此文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谢天谢地，时代真的不同了！我的胆子壮了起来，便挤时间放开手脚地写了。从而，才有下面这组文章的产生。

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应该再议

迄今为止，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似乎已成定论。即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现代史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直至今日。仔细研究一下，这一分期的某些部分，似有商榷之处，应该再议。

一

这个传统的分期论，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是对的、科学的。因为从此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使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再完整，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从而使中国由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了，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了。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变成农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了。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形态和革命的性

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战国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它的尽头，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代替了原来的封建社会。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而，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无疑是正确的。最近，苏联出版的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定为 1644 年清兵进京时，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的，是反科学的，是怀有险恶的反华用心的。

但是，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和中国现代史的上限定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却值得商榷。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划时代的事件。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宣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了起来；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它具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都不曾有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五四”运动的这些伟大历史功勋是肯定了的。然而，不能说因为“五四”运动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就使之构成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呢？不一定。笔者认为“五四”运动不能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而应该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更重大的划时代事件，为中国近代史的终结和现代史的开端。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二

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这些历史术语的含义，都是相对的。过去的现代，已成为今天的古代；今天的现代，必然成为未

来的古代。所以要给这些历史术语下个准确的永恒的定义，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从相对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认为，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历史时期，将来必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存在，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这里讲的是一般规律。不同国家或民族还应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有的国家或民族，其发展的五个阶段都已经历或将要经历；有的国家或民族却没有经历过其中的某个甚至某几个阶段。如中国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目前，我国史学界对人类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时代都给予了一个相应的称呼，使之加以区别。如把原始社会至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称为“古代史”。对其中的三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称呼又加以细分，把原始社会的历史称为“远古史”；奴隶社会的历史称为“上古史”；封建社会的历史称为“中古史”（或“中世纪史”）。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称之为“现代史”。这些称呼（或历史术语），基本上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并已经成为习惯。

从这些习惯的分期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划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依据，基本上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特别是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就是明确地以两种社会制度的建立为标准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所谓近代史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所谓现代史，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胜利、发展和壮大，资本主义社会进

一步发展、衰亡的历史。

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划分人类历史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各个历史时代的依据，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曾经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由此可知，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不同的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所代表的是不同历史时代。也就是说，划分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分期依据应该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在这里是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究竟是指局部地区的一种生产方式，还是指带有普遍性的世界范围的一种生产方式，史学界还有争论。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总的看来，可以说是泛指原始社会这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古代的”生产方式，当然是指奴隶社会的经济形态。“封建的”生产方式自然是指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的“现代资产阶级方式”，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不过，他那时的“现代”发展到我们今天，已经变为“近代”了。19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于“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历史划分，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总趋势归纳为五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并将不同时代的历史划分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统一起来决定历史分期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如果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划分历史时期的依据，那么现行的传统的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就有值得再商榷之处。

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有过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相应的，由世界资本主义派生出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历史时期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共计一百一十年。这个时期，在同一个社会经济